

## 第三章 托翁創作《戰爭與和平》的思想淵源和生活 根據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同時也是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天地中最後一座也是最為高大的山峰。在對全世界有巨大影響的俄國文學中，他是創作時間最長、作品數量最多、影響最深遠、地位也最崇高的作家。他是人類文化史上少數的巨人之一。托爾斯泰一生高齡 82 歲，創作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其生平和創作都有漫長的發展過程，須要認真地做分析和評判。

### 第一節 托翁生平與創作的關聯

托爾斯泰的全名為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有時也簡稱列夫·托爾斯泰。作為俄國的著名大作家，其特點是畢生都在探索「人生的真諦」。他本身和作品裏的主人翁常常會自我發問這樣的問題：「我是什麼人？」「我為什麼活著？」因而他的創作過程，也是不斷在探索、思考這類問題，結果便是形成了其作品思想內容深刻，一向在尋求人生的哲理。他的思考有了一定程度的答案，即人活著是為了他人，為了上帝，尤其是為了下層人民。這種想法到晚年甚至發展成「平民化」，即放棄貴族特權，投向平民階層。正是這一點競業的精神，構成了托爾斯泰美麗的人生。

托爾斯泰於 1828 年 8 月 28 日（舊曆）出生在一個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一生是充滿激情、充滿矛盾，及不斷探索、不斷追求的一生。

他自幼就熱愛勞動，在與農民和自然接觸中初步形成他自己的世界觀中某些重要的基礎。托爾斯泰在十八歲的時候，放棄在大學中繼續學習，回家致力於改善農民的生活，但因為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以及身為地主的身分，在主觀上與客觀上的實施上均是困難重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為了深入了解人民

的生活，毅然從軍參加高加索的戰役。同時，開始寫作小說《童年》使他一舉成名。在這個時期，他所創作的《一個地主的早晨》等作品中，提出了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1857年，托爾斯泰赴西歐考察，對西方文明中階級壓迫的黑暗面深惡痛絕，這種情緒表現在他的短篇小說《盧採恩》中。回國後，他致力於在他的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為農民辦學，想以此來找到社會的出路，後來又為了這個理念再次出國考察。

1861年，農奴制度改革時，他因為維護農民利益而遭到憲兵的搜查。在六十年代，托爾斯泰介於三十五歲到四十歲期間，基於自己對人民在歷史中的地位之思考，寫出了不朽鉅著《戰爭與和平》。而深刻地反應出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同時也反映出作家自身思想的矛盾與發展的《安娜·卡列妮娜》則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寫成的。

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被徹底轉變的時間是在八十年代他創作《復活》這部作品的時期，在這個時候，托爾斯泰毅然放棄他身為貴族的地位，成為俄國千百萬農民的代言人，誓與政府和教會為敵。在這段時間，他除了《復活》之外，還寫出《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等作品，強烈地控訴黑暗社會，也表現出他在自己思想深處嚴肅的探索及深刻的矛盾。這時他的「托爾斯泰主義」如宗教教義般地傳遍各地，他已經是一位名揚全球的偉人，為了貫徹自己的信念，他堅持自己進行耕種、製鞋、劈柴等體力勞動，但他卻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奢華的貴族地主家庭環境中，為此，他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苦惱中，這一時期心靈深處痛苦的追求，反映在《克萊採奏鳴曲》、《魔鬼》以及《謝爾蓋神父》等作品中，俄國一位反動文人當時曾說：

我們有兩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與托爾斯泰。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束手無策，托爾斯泰則能動搖尼古拉二世的寶座。<sup>1</sup>

1901年，托爾斯泰被東正教教會開除教籍，但這只是更加擴大他的影響力；1908年全俄國對他八十誕辰的慶祝活動成為俄國各派政治勢力的一場鬥爭。而聲名顯赫的托爾斯泰仍在自己內心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和不斷地探索。1910年10月28日（舊曆），在經歷長期劇烈的思想矛盾與家庭衝突後，托爾斯泰為了尋求

<sup>1</sup> 轉引自李明濱《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見《世界文學名著選評》第1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思想的出路和靈魂上的安寧，冒著風雪走出家門，數日後，客死在一個小火車站上，享年八十二歲。這位複雜而單純、現實又浪漫的偉大人物，就此結束他的一生。

在托爾斯泰全部作品中，《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是三個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

## 第二節 前期，在寫作《戰爭與和平》時的思想與創作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創作的前期。1852年他發表第一部作品《童年》開始了文學活動。這部小說和後來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傳性的三部曲，體現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寫貴族少爺尼古連卡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尼古連卡從童年開始就顯出崇敬誠實樸素的家庭教師，反對在家中人與人之間講究地位、不平等對待的習氣。他也習慣於同情弱小者，反對強權者，並且在生活中付諸實行。從總體來看，尼古連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虛榮的惡習，接受了貴族階級的一些偏見，另一方面更看到這個階級的虛偽與自私。他從青年時期就開始洗滌自己的靈魂，追求「人生的真諦」。作品從道德的角度揭露貴族社會而引起反響。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傳性成分。它描寫青年地主聶赫留朵夫從「博愛」出發，為農民蓋房子，實行減役減租，發放簡易農耕機械供農民使用。他想用這類辦法把農民從貧困中拯救出來，終因得不到農民的信任而失敗。

反映克里米亞戰爭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855-1856)使托爾斯泰獲得了聲譽。他用俄國士兵的勇敢去對照貴族軍官的腐敗，以表現他對貴族社會的不滿。同時，他贊揚士兵的愛國精神。他因這部作品心理描寫方法的新穎而被著名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譽為「心靈的辯證法」。

1855年末，托爾斯泰前往彼得堡，認識了《現代人》雜誌的主編涅克拉索夫等一些進步作家。1857年，他發表短篇小說《盧塞恩》。這是他根據旅行西歐時在瑞士風景區盧塞恩的見聞寫成的。小說譴責了英國紳士們對一個流浪歌手的

欺凌。作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虛偽的。但他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全盤否定了資產階級帶來的進步。

從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從創作活動一開始，就敏銳地注意到俄國社會裏上層與下層、地主與農民、貧與富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尖銳的對立。他既對貴族階級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滿，又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但是他想靠「世界精神」使人們「互相親近」，使矛盾變為「無限的和諧」。卻是無法實現的幻想，因為貴族壓迫平民那種殘酷的現實是托爾斯泰無法改變的。掌權者是不會輕易放棄權力的，這一點使托翁思想陷於極度痛苦，一生都無法解脫。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環繞著農奴制問題的鬥爭日趨尖銳。托爾斯泰同革命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歧。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主張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專制農奴制度。托爾斯泰反對這種革命觀點。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進步雜誌《現代人》。不過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使他大為失望。他說，「沙皇政府的農奴制改革除了許諾以外，別無他物」。他在擔任地主和農民之間的調解人時，「對農民表現了特別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貴族的「切齒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後，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推行啟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莊園中興辦小學，發行教育雜誌《亞斯納亞·波良納》(1862-1863)。1863年他發表中篇小說《哥薩克》，描寫貴族青年奧列寧拋棄城市的安樂去高加索從軍，決心同哥薩克一起過樸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個哥薩克姑娘的戀愛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為山民們所鄙棄，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貴族青年脫離上層社會，返回自然。實現當時啟蒙主義思想家們所嚮往的「返樸歸真」的理想，作者也是厭惡城市文明的。這說明作者對貴族階級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只好訴諸一種脫離現實的理想境界。奧列寧這個現象，同作者已往的自傳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體現了托爾斯泰對於俄國社會問題和貴族出路問題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爾斯泰停止辦學，埋頭於文學創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連寫出兩部長篇鉅著《戰爭與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戰爭與和平》以1812年俄法戰爭為中心，從1805年彼得堡貴族沙龍談論對拿破崙作戰的事寫起，中經俄奧聯軍同拿破崙部隊之間的奧斯特里茨戰役、1812年法軍對俄國的入侵、鮑羅金諾會戰、莫斯科大火、法軍全線潰退，最後

寫到 1820 年 12 月黨人運動的醞釀為止。全部以保爾康斯基、別祖霍夫、羅斯托夫和庫拉金四個豪族作主線，在戰爭與和平的交替中，展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家庭生活的無數畫面；描繪了五百五十九個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將帥、貴族、下至商人、士兵、農民；反映了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情緒；提出了許多社會、哲學和道德問題。

小說揭露和譴責了宮廷官僚和上層貴族的腐敗。但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否定整個貴族階級。他竭力歌頌羅斯托夫一家那種溫情脈脈的莊園貴族的品德和保爾康斯基一家那種忠貞為國的老貴族的古風。他還著意塑造了兩個理想的貴族青年形象 - 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和皮埃爾·別祖霍夫。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出身名門，但他鄙視上層貴族的庸碌，決心靠戰功以成就自己的功名。皮埃爾·別祖霍夫嚮往理想的道德生活。在戰爭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難，企圖刺殺拿破崙，被俘後，受到宿命論思想的農民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的啟示，形成了順從天命、愛一切人的世界觀。後來他和羅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結成美滿幸福的家庭，最後他參加秘密團體的活動，接近了十二月黨人式的叛逆思想。作者通過這兩個人物著重宣揚的是「為上帝而活著」、「愛一切人」的道德觀。

小說很注意描寫人民群眾，贊揚他們在抗擊法軍入侵時的愛國精神。士兵的高昂鬥志，農民在在游擊戰中的英雄行為等等，都被刻畫得細致而生動。托爾斯泰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群眾的情緒，而不是帝王將相。

《戰爭與和平》顯示，作者意圖從歷史上去尋求俄國社會問題的答案，他寫的是歷史故事，要解答的卻是現實問題。其結論即是：靠貴族中的優秀者，或尚未腐敗的人物，與平民聯合在一起來拯救俄國，使它免於潰敗和衰亡。

《安娜·卡列尼娜》的問世，是托爾斯泰的創作新進展的標誌。起初，他只打算寫一部家庭生活小說，敘述一個已婚女子的不貞和由此產生的悲劇。但七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造成社會的大動盪。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擴充了原來的構思，引進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提出很多迫切的問題。用托爾斯泰借書中一位主要人物列文之口說出的一句話：「現在在我們這裏，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可以最恰當的說明 1860 至 1905 年這個時期。那翻了一個身的東西，就是農奴制以及整個「舊秩序」而那剛剛開始安排的東西，卻是托爾斯泰極不願意看到的資產階級制度。

小說由兩條平行而又互相聯繫的線索構成。一條是貴族婦女安娜，她由於對

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寧不滿，愛上了花花公子渥倫斯基，並和他同居，她的行為遭到貴族社會的鄙棄，後來她又受到渥倫斯基的冷遇，終於在痛苦和絕望中臥軌自殺。圍繞著安娜對愛情的追求，作者對上流社會、官僚貴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畫。另一條線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貴族小姐吉提的戀愛、波折、終成眷屬的故事。作者通過列文對事業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廣泛描寫了農奴制改革後的地主、農民、新興資產者、商人階層。

安娜是一個追求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人物。她不願過互相欺騙、沒有愛情的家庭生活。她為了自己的幸福離家出走，但是為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觀所不容。忠於封建操守和追求個人幸福這兩種思想，在她心裏形成激烈的衝突。結果她在「一切全是虛偽」的慨歎中，在「上帝，饒恕我的一切」的哀號中死去。安娜的悲劇是對封建貴族社會暴露和抗議。

作者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是雙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她的貴族社會的荒淫和虛偽；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安娜是為「情慾」所支配，破壞了家庭的和諧，也毀滅了她自己。在托爾斯泰看來，家庭關係是宗法制度的基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愛，長幼相親，才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幸福。正因為安娜追求個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員蒙受犧牲，從而違反了「愛」的教義，作者才讓她飽受折磨，並使這一形象蒙上一層罪人的色彩。他認為安娜應當受譴責，但是上流社會比她更壞，根本不配懲罰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爾斯泰借安娜的悲劇無情地撕破了上層貴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其中另一位主要人物列文體現了托爾斯泰的理想，代表她這一時期的思想特點。列文是一個貴族地主，他贊揚自給自足的農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個戈比就可以買到農奴的資產者」，反對地主採用西歐方式經營田莊。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國農奴制崩潰、資本主義成長的事實。為了挽救貴族地主的沒落，他實行農事改革，把自己的莊園當作使俄國避免資本主義的試驗場。他主張地主參加部分勞動，農民參加部分管理，以誘使農民更多地幹活。照他的說法，這樣「農民好一些，我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的改革還是失敗了。他感到絕望，只好在「博愛」中尋求精神平靜，終於皈依宗教。從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後期的某些農民觀念這時已開始形成。

### 第三節 後期，在寫作《戰爭與和平》後思想與創作的發展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是托爾斯泰創作後期的起點。這時，俄國的階級鬥爭又趨激烈。農民在「農奴制改革」瀕於破產，又遇上連年歉收，成千上萬人死於飢餓與瘟疫。農民被迫奮起抗爭。農民運動與新起的工人運動相會合，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勢，喚起了托爾斯泰的注意。他在 1878 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蘇里奇刺殺彼得堡總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緊社會活動，遍訪大教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父談話，出席法庭陪審，參觀監獄和新兵收容所，調查城市貧民區等，這一些使他更加認清專制制度和剝削階級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界觀的劇變。他在《懺悔錄》(1879-1881)裏說：「1881 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上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熾熱的時期」，又在日記中寫道「我棄絕了我那個階級的生活」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來說，托爾斯泰是屬於俄國上層主義地主貴族的，但是他拋棄了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轉到宗法制農民的觀點上來了。

托爾斯泰轉變後的世界觀仍然包含著顯著的矛盾，既有強有力的一面，又有極軟弱的一面。強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裏，對現代一切國家制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sup>2</sup>，達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sup>3</sup>成為一個「強烈的抗議者、激憤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而托爾斯泰的軟弱方面，則是他鼓吹「不以暴力抗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愛」等托爾斯泰主義。

托爾斯泰在《懺悔錄》、《那麼我們應當作麼辦?》(1886)及《宗教神學批判》(1880)中，在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和《教育的果實》(1886-1889)中，都表達了他轉變以後的觀點。

其中不少作品是用宗法制農民的觀點來看社會人生的。有的作品對黑暗社會

<sup>2</sup> 列寧：《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列寧全集》第 16 卷，第 330 頁。

<sup>3</sup> 列寧：《托爾斯泰和農產階級鬥爭》。《列寧全集》第 16 卷，第 352 頁

做出抨擊。像《黑暗的勢力》寫一個雇工由於貪財而殺了情婦的丈夫和嬰兒，但受到篤信基督的父親開導，終於懺悔、認罪。說明金錢是腐蝕農民心靈的「黑暗勢力」，只有農民純樸的道德才能克服之，使農民避免現代文明社會的負面影響，即為追求金錢而墮落。

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最充分地反映托爾斯泰後期世界觀的矛盾。他起初的構思是以一件訴訟案為基礎，寫一本道德教誨小說。但在十年創作過程中，他數易其稿，主題前後迥異，最後寫成一本表現尖銳的階級對立、政治意義很強的社會問題小說。

《復活》寫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奸了農奴少女卡秋莎·瑪絲洛娃，隨後遺棄了她，使她備受凌辱，淪為娼妓，最後又被誣告犯殺人罪而下獄，並判處流放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作為陪演員在法庭上與她重新見面，受到良心譴責，決定賠罪，為她奔走伸冤，上訴失敗後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為感動了瑪絲洛娃，使她重又愛他。但她為了不損害他的名譽地位，終於同一個「革命者」結婚。通過這些情節，作者反映了兩個主人翁在精神上「復活」。

又如短篇小說《舞會以後》(1903)揭露沙皇政府蹂躪少數民族的暴行，更是令人髮指。從而使小說也成為名篇。作品的主人翁伊凡在思想感情上經歷了兩次昇華。第一次在舞會上，他對上校軍官的愛女瓦蓮卡的感情由傾慕，漸至熱戀，直到陶醉。愛情鼓勵他向上，達到高尚境界，不但自己向善，而且擴大愛的範圍，也要愛女友的父親，即那位笑容可掬的上校，還要愛一切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用愛擁抱世界」。

然而舞會以後，情節陡轉，他的心情急轉直下。這是由於看到瓦蓮卡的父親，即那個在舞會上如此慈祥的上校，跳完舞以後還赴操場，親自指揮「夾鞭刑」的慘景。那種酷刑的方法，就是把一名韃靼族士兵，脫去上身的衣服，由人架著從排成兩列的士兵隊列中通過，令兩邊士兵依次用棍棒擊打其赤裸的後背，把那名士兵打的鮮血淋漓，慘不忍睹。主人翁描述他恐怖的印象。

這是一個斑斑駁駁的、紫紅色的、奇形怪狀的東西，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人的軀體。

上校那劊子手的真面目使主人翁心目中的「愛」的世界傾刻崩毀。他由強烈的愛轉為極度的憎，既憎惡上校，也不再愛其女兒瓦蓮卡了。他懂得了花田錦簇掩蓋下的那個社會是畸形和醜惡的。於是他的思想感情出現了第二次昇華。這一

次是沿相反的方向：由極愛轉向極憎，達到了理性的認識社會、認清社會，終於決心不再與那個社會同流合污。他「不像原先希望的那樣去服軍役了」，不但沒有去擔任軍職，也沒有在任何地方供職了。

如果說第一次思想感情昇華能理解的社會人生是虛假的，那麼第二次昇華能認識的社會現實就是真實的了。作品緊扣事件在人物內心引起的波瀾，比單純描述酷刑的慘象會更令人受震撼，也使人進一步體會到托翁「心靈的辯證法」之手法，感受其力度和特點。

小說揭露了法庭、監獄和政權機關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殘暴和法律的反動。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執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隨隨便便將瑪絲洛娃判刑。接著，在主人公上訴的過程中，作者又進一步鞭打了高官顯宦：國務大臣是個吸血鬼，樞密官是蹂躪波蘭人的罪魁，要塞司令隻手沾滿起義農民的鮮血，副省長經常以鞭打犯人取悅。托爾斯泰憤怒地控訴道：人吃人並不是從原始森林裏開始，而是在各部會、各衙門裏開始的。他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法院的階級實質：

法院無非是一種行政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階級有利的現行制度罷了。

小說又撕下了官辦會的「慈善」面紗。神父們貌似正經，實際是為了多撈得「一筆收入」。獄中做禮拜的場面令人毛骨悚然，「饒恕我！」的祈禱聲竟和囚犯的鐐銬聲響成一片。作者激憤地揭發，專制政府殘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會支持的，教會不過是沙皇的另一種統治工具。因此，不但書中的這類描寫被審查機關砍掉了許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開除了教籍。

本書比托爾斯泰過去的任何作品都更為深刻地指明了農民貧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佔有制。農村滿目荒涼，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卻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國農民發出沉痛的呼籲：

土地不能成為任何人的財產，它跟水、空氣、陽光一樣，不能買賣，凡是土地給予人類的種種好處，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權。<sup>4</sup>

同時，小說裏也有許多負面的內容。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通過「懺悔」和「寬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復活」，使「人性」由喪失到復歸；在這裏，作者宣揚了他「不以暴力抗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愛的宗教」等的

<sup>4</sup> 楊周翰、吳達元、趙夢蕤主編《歐洲文學史》下冊 343 - 35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托爾斯泰主義」。在小說結尾，他甚至宣傳「愛仇敵，幫助敵人，為仇敵效勞」的教義。

1905 年革命前夕，托爾斯泰寫了中篇歷史小說《哈吉穆拉特》(1904)，抨擊沙皇軍隊和政府的暴虐專制。小說以揭露沙皇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暴政為主題，更為具體地針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橫暴。書中寫到，尼古拉一世這位俄國末期的沙皇荒淫無恥，專橫愚蠢，是一個「殘忍的、瘋狂的、不正當的最高統治者」，殘酷鎮壓高加索少數民族。小說同時寫到沙米爾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恰好是反對沙皇政府侵略的。不過，哈吉一穆拉特這個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比較複雜，他身上有托翁所欣賞的自然、樸素、豪爽、真誠和生氣勃勃的特點，最終卻背叛了民族解放運動。拿他同那些誓與俄國沙皇政府的入侵者拚到底的眾多山民相比，哈吉一穆拉特的死當然不值得同情。所以主人翁的死使作者聯想起牛犁過田的地裏被車軋倒的一棵牛蒡花。托翁以此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即置之不理。不過，作品的重心仍在於暴露沙皇政府的凶殘，抨擊沙皇軍隊的橫暴。

1905 年革命後，他既否定這次革命，又反對平反動政府派對革命者的鎮壓。晚年，他千方百計要擺脫貴族的特權生活，放棄私有財產，堅決走「平民化」的道路，終於在俄曆 1910 年 10 月 28 日夜棄家出走，11 月 7 日病逝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托爾斯泰繼承了俄國和西歐批判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並善於創新。包括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三部代表作品在內的全部創作都含有豐富的生活內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歷史問題，藝術表現領域極為廣闊。他擅長深刻細緻的心理描寫，尤其善於刻畫人物思想感情的產生和變化，使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他的語言精確、鮮明，能夠表達事物的特徵和本質。但是，有時托爾斯泰的說教損害了他的藝術形象和作品的合理性。